

影印
四庫全書

影印

文淵閣四庫全書

第一冊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北京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/ (清) 紀昀等編纂. — 影印
本. —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12.4

ISBN 978-7-200-09184-7

I. ①影… II. ①紀… III. ①四庫全書 IV.
①Z121.5

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(2012) 第 059042 號

策 劃: 方應權

責任編輯: 楊良志 蔡紫昀

責任印製: 宋 超

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

(清) 紀昀等編纂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

北京出版社

北京北三環中路六號

郵政編碼: 100120

北京出版集團公司總發行

北京鴻博儒文化傳播有限公司

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: 十六開 七八七毫米×一〇九二毫米

印張: 七五〇〇〇印張

二〇一二年四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定價: 陸拾萬圓整

ISBN 978-7-200-09184-7



9 787200 091847 >

影印『文淵閣四庫全書』出版說明

楊良志

『四庫』一詞，最早見於《新唐書·藝文志一》：『兩都各聚書四部，以甲、乙、丙、丁爲次，列經、史、子、集四庫。其本有正有副，軸帶帙籤各異色以別之。』

這種說法的形成，是有一個歷史的過程的。三國時魏國的中郎荀勗將書籍分爲四部：甲部，六藝小學；乙部，諸子兵書術數；丙部，史記及其他記載；丁部，詩賦圖贊。入晉，中書侍郎李充重分四部，以五經爲甲部，史記爲乙部，諸子爲丙部，詩賦爲丁部，定爲經、史、子、集。隋唐以後，對於書籍的分類，就多用這『四部』爲序了，這一點在《隋書·經籍志》中有明確的記載。

回顧我國的文明史，大抵社會安定、經濟昌盛的朝代，在文化上總會有大手筆、大作爲。三國時魏文帝令劉劭、王象等編《皇覽》——供皇上閱讀的專書，據記錄書分四十餘部，總一千餘卷，這或許可稱是皇家主編大型類書叢書之濫觴。隋唐之際先有《北堂書鈔》（虞世南輯，一七三卷，八五二

類》，後有《藝文類聚》（歐陽詢輯，四八部，一〇〇卷）。宋代有《太平廣記》（李昉等編，九二門，五〇〇卷），《太平御覽》（李昉等編，五五門，一〇〇〇卷，四五五八類），《冊府元龜》（王欽若等編，一〇〇〇卷，三一部，一一〇四門）。至明代，《永樂大典》最爲有名，明成祖敕解縉、姚廣孝等領銜，參與其事者二千餘人，自永樂元年（一四〇三年）至永樂五年功成，凡二二八七七卷，一一〇九五冊。進入清代，康熙、雍正兩朝皇帝把國力大大地提高了一步，當然也要在『文治』上有所鑄就。康熙四十年（一七〇一年）啓動，雍正三年（一七二五年）完工，先後由翰林院編修陳夢雷和文華殿大學士蔣廷錫主持，編成了《古今圖書集成》，全書一〇〇〇〇卷，分爲六編，三二典，六一〇九部，約有一億六千萬字。因爲歷史的動蕩，這部書的原稿本祇殘存其中的數百冊，幸爾有雍正六年（一七二八年）的內府銅活字版印行，今天我們讀《古今圖書集成》並不難。

乾隆即位，國運昌隆，他無疑要步着前輩的鴻業做出更輝煌的舉措。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（一七七二年二月七日），他頒詔曰：

今內府藏書插架不爲不富。然古今來著作之手，無慮數千百家，或逸在名山，未登柱史，正

宜及時採集，匯送京師，以彰千古同文之盛。其令直省督撫會同學政等，通飭所屬，加意購訪。……庶幾副在石渠，用儲乙覽。從此四庫、七略，益昭美備，稱朕意焉。欽此！

此詔令出，翰林院編修、安徽學政朱筠即提出了落實皇旨的四點建議：一、『舊刻抄本，尤當急搜也』；二、『金石之刻，圖譜之學，在所必錄也』；三、『中秘書籍，當標舉現有者以補其餘也』；四、『著錄校讎，當並重也』。羣臣們也贊襄聖謀，並支持與補充朱筠的主張，於是在第二年即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，四庫全書館在翰林院內宣告成立，修書工程大舉肇始。劉統勳、于敏中等為總裁官，紀昀、陸錫熊等為總纂官，陸費墀等為總校官；戴震主經部，邵晉涵主史部，周永年主子部，紀昀兼主集部；再諸如王念孫、朱筠、翁方綱、王太岳、姚鼐、盧文弨、金簡、朱珪、彭元瑞、曹錫寶等通才大儒，都參加了這一工程。乾隆實際上是調集了各方面的人力加強了四庫館蘊涵的能量，數一數《四庫全書》卷首開列的館員題名錄，就知道共任命正式館員三百六十人之多——而在實務上還有許多學者專家未見於題名。

在工程的推進之中，乾隆在許多時候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。《四庫全書》的『凡例』共二十則，

其第一則就明確昭告：

是書卷帙浩博，爲亘古所無。然每進一編，必經親覽；宏綱鉅目，悉稟天裁。定千載之是非，決百家之疑似……隨時訓示……與歷代官修之本泛稱『御定』者迥不相同。

這其中的『親覽』、『天裁』等等，當然指的就是乾隆。皇帝率先垂範，羣臣豈敢玩忽懈怠？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——若從乾隆頒詔書編《四庫》算起，整整十年；若從《四庫》館啓動算起，亦有九年——第一部《四庫全書》宣告完成。前述那數百位學者大儒的搜訪採集、整理校改之功且不說，即使是繕寫抄錄人員，也有一千五百多人！全書集納古書三千四百六十種，累計七萬九千三百餘卷，總共三萬六千餘冊。再做進一步統計，則可知全書多達二百三十萬個『筒子頁』，也就是有四百六十萬頁之鉅，而字數爲九億九千多萬字，這大略是前面提及的《永樂大典》三億七千萬字的近乎三倍！或許，這也是人類文明史上迄今爲止最大規模的一套書吧。

《四庫全書》按經、史、子、集分爲四部，每部之下又分爲若干類：經部有易、書、詩、禮、春秋、孝經、五經總義、四書、樂、小學十類；史部有正史、編年、紀事本末、別史、雜史、詔令奏議、

傳記、史鈔、載記、時令、地理、職官、政書、目錄、史評十五類；子部有儒家、兵家、法家、農家、醫家、天文算法、術數、藝術、譜錄、雜家、類書、小說家、釋家、道家十四類；集部有楚辭、別集、總集、詩文評、詞曲五類。四部總計四十四類，涵括之全備，內容之豐贍，可稱是空前的。

乾隆三十七年（一七七二年），乾隆下詔要編《四庫》時，他六十二歲；至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《四庫》編成，他已是七十三歲的老人了。幾年以後，乾隆五十五年（一七九〇年），當他主持的又一浩大工程《清文翻譯全藏經》完成之際，這位年逾八旬的老人慨嘆：

爲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天而不佑，事何能成？人而不爲，天何從佑？然而爲事又在循理；爲不循理之事，天弗佑也！予所舉之大事多矣，皆賴昊乾默佑，以致有成，則予之所以感貺奉行之忱，固不能以言語形容，而方寸自審，實不知其當何如也！武功之事，向屢言之。若夫訂《四庫全書》，及以國語譯漢《全藏經》二事，胥舉於癸巳年六旬之後；既而悔之，恐難觀其成。越十餘載，而《全書》成；茲未逮二十載，而所譯漢《全藏經》又畢藏！

年事已高，浩大的工程業已啓動，曾自忖恐怕見不到功成之日的，但實際上曠日持久的皇皇大業

立在眼前，老人心中洋溢着的滿足與得意形於言表！

重要性超乎尋常，規模也超乎尋常的這麼一套書，當然要有個合適的存放之所。乾隆早已想在了前面。明代紫禁城的東南隅，就曾建有文淵閣，著名的《永樂大典》就是度藏於斯的，祇可惜建築連其內的藏書都在明末的戰火中被毀。乾隆四十年（一七七五年），《四庫全書》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日夜督進之時，乾隆乃命仍在紫禁城的東南隅，文華殿後，照着浙江寧波著名的天一閣藏書樓的樣式，預建了文淵閣。這文淵閣外現二層，內實三層，閣前築方池，有金水河注入。當這文淵閣即將竣工的『甲午（一七七四年）孟冬月』，乾隆親撰《文淵閣記》，其中說要將『浩如淵海』、『委若邱山』的羣書編入《四庫全書》，『蓋以古今數千年，宇宙數萬里，其間所有文書雖夥，都不出四庫之目也』。他還說『書之成雖尚需時日，而貯書之所，則不可不宿構……爰於文華殿後建文淵閣以待之』。幾年之後，《四庫》首部告成，隨即度藏於文淵閣內：第一層，二十二架，置經部；第二層，三十三架，置史部；第三層，二十二架置子部，二十八架置集部。文淵閣於是也就成為乾隆重要的辦事處所之一。在人們的習慣上，這首部《四庫》因為存於文淵閣，世人遂以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稱之。

乾隆是一個運思周密、舉措超常的皇帝，他的《文淵閣記》中就強調了『凡事豫則立』的戰略思想。當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功成之際，歷史上鉅典焚為灰燼的慘痛教訓和現實中對這套書的實際需要，都使乾隆深切地知道：僅有這一套書是遠不敷用的！書，他下旨要繕抄幾套；存書之所，也要相配地建築幾處。如同文淵閣先建成於乾隆三十九年（一七七四年），預待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完工的首套《四庫全書》一樣，乾隆皇帝同樣是『未成書，先蓋屋』：一七八二年建成盛天（今瀋陽）故宮的文溯閣，存儲一七八三年抄畢的第二套《四庫》，是為『文溯閣《四庫全書》』；一七七四年建成北京圓明園內的文源閣和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，分別存儲一七八四年抄畢的第三套《四庫》——是為『文源閣《四庫全書》』和一七八五年抄畢的第四套《四庫》——是為『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』。

前述的這四座度藏《四庫全書》的藏書樓，通稱為『內廷四閣』或『北四閣』，它們的名稱上分別有『淵』、『源』、『津』、『溯』這『水』旁之字。想一想它們的大意是：文化的積累以成『淵』海，知識的遠流『源源』輸出，每每有渡『津』可以尋路向前，以致於求『溯』而上直取巔峰……這其中

自然涵蘊着極大的啓發意義。

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乾隆下諭：

江浙爲人文淵藪，朕翠華臨蒞，士子涵濡教澤，樂育漸摩，已非一日。其間力學好古之士，願讀中秘書者，自不乏人。茲《四庫全書》允宜廣佈流傳，以光文治。

遵此旨四庫書館又繕寫了三套《四庫全書》，於乾隆五十二年（一七八七年）全部告竣，分別度藏於揚州天寧寺的文匯閣、鎮江金山寺的文宗閣和杭州聖因寺的文瀾閣。這三座貯藏《四庫全書》的藏書樓通稱爲『江浙三閣』或『南三閣』。

《四庫全書》用紙極爲考究，細韌潔白，是著名的浙江開化上等榜紙。紙面上朱絲欄，用工整規範的楷書抄寫。全套書用精織的絹面包封。因爲全書除前面的一些冊是其目錄之外，經、史、子、集是主要的組成部分，所以不同的部類採用了不同顏色的絹料：目錄用明黃色，經部用綠色，史部用紅色，子部用藍色，集部用灰色。後邊這四種顏色實際上是由春、夏、秋、冬四季的象徵色稍加演變而來的，乾隆爲此曾賦詩曰：

浩如慮其迷五色，挈領提綱分四季。

經誠元矣標以青，史則亨哉赤之類。

子肖秋收白也宜，集乃冬藏黑其位。

乾隆帝用心之縝密與細巧，於這一小詩可現一斑！在《四庫全書》封面的實際用色上，因為各種原因對此又有所調整，這也是不難理解的。

『北四閣』加上『南三閣』，由北到南，七座巍然的藏書樓裏敬貯着七套《四庫全書》，這『軍團』不可不謂超強大，這陣容不可不謂超豪華！然而，乾隆之後，隨着清王朝的逐漸衰落，尚不足百年，這七套《四庫全書》就陷入了多災多難的命運。先是，咸豐三年（一八五三年），揚州文匯閣、鎮江文宗閣的兩套書毀於太平軍的戰火；繼是，咸豐十年（一八六〇年），圓明園文源閣的那套書，為英法聯軍所焚毀；再有，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年），太平軍攻進杭州，『文瀾閣《四庫全書》』在戰亂中散佚！至此可以說，『南三閣』《四庫全書》除『文瀾』還留些殘本外，基本上已無書可尋；『北四閣』《四庫全書》已毀掉『文源』，祇有『文淵』、『文津』、『文溯』三套存世。

『文津閣《四庫全書》』，於民國四年（一九一五年）由承德運抵北京，交當時的『京師圖書館』典守，地點在東城方家胡同的舊館址。如今，這套書在北京西部的白石橋『國家圖書館』內，的為『鎮館鉅寶』之一。

『文溯閣《四庫全書》』，曾於民國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遷運北京，後於民國十四年（一九二五年）又運返瀋陽，九一八事變後為日本所掠取，抗戰勝利後被蘇聯『接收』，新中國成立後幸留本土，一九六六年由瀋陽移送蘭州交甘肅省圖書館收藏。

紫禁城內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的遭遇也絕非一帆風順：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後，這套書先由『古物陳列所』後由『故宮博物院』保管；一九三三年日本加劇侵略，華北危急，國民政府把這套書運往上海存『中央銀行』；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，這套書輾轉運到重慶；一九四八年國民黨政府逃離大陸前，將這套書轉運至臺灣，後度藏於臺北『故宮博物院』。

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是首先繕抄完成並存奉在皇帝眼皮底下的，所以世人也就習慣地稱其為『正本』，而將嗣後所出稱為『副本』。這裏順便提及有關《四庫》的另一個概念：『底本』。編修《四

庫》時所調用的大量版本，是供皇家學者閱讀、校改以至抄錄的，它們被通稱為『《四庫》底本』。在編修《四庫全書》的翰林院中，這些『底本』參差錯落，曾是堆疊如山的；但在時代變化的浪淘風簸之下，『底本』散失，所剩無多了！

《四庫全書》因其重要的歷史文化價值，自問世之後的二百多年來，學者們圍繞着它所進行的閱讀、考辨、批評與研究從未停止過，社會上對《四庫全書》的需求越來越迫切。臺灣文化界和出版界的朋友，由臺灣商務印書館運作，在一九八三至一九八六年間，將貯藏在臺北『故宮博物院』的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影印出版，做了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。

《四庫全書》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集大成，是中華民族祖先智慧與辛勞的結晶，是全體中國人民共同的寶貴遺產。一九八八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也影印出版了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，這就給更廣泛的學人提供了閱讀和研究的便利。

實際上，中國大陸近三十多年來，對《四庫全書》的研究已投入了愈來愈多的人力與物力，使『四庫學』逐漸成為一種『顯學』。從圖書出版的角度說，目前已編纂出版了：

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齊魯書社，一九九七年）；

《四庫禁毀書叢刊》（北京出版社，一九九九年）及其《補編》（北京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）；

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（北京出版社，二〇〇一年）；

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二年）。

而且，更大規模的一套書，即以『《四庫》底本』為主要集納對象的、意圖在於展現《四庫》諸本在經四庫館臣審改前面貌的一套書，目前正在編纂和出版的過程中：

《四庫提要著錄叢書》（北京出版集團公司·北京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）。

對於《四庫全書》的閱讀與研究，應該說是沒有止境的。正是因為陸續地有相關的部門機構和讀者個人對『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』有閱讀研究的需求，北京出版集團公司·北京出版社決定將這套書影印出版。

筆者因着工作的需要，在二十世紀尾十年、二十一世紀首十年這二十多年的光陰中，落實了《四庫禁毀書叢刊》及其《補編》、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的面世，並且正在抓緊《四庫提要著錄叢書》的出

版，即是說歷史的機緣給我以同『四庫』書類多打交道的幸運，故此不揣淺陋，寫了如上這些話。疏漏之處，敬請方家教正！

二〇一二年八月

本冊目次

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出版說明……………一

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 清 紀 永 昀 琿 等撰……………一